

詩卷兵書總可哀

——解讀阿壠與胡風的書信往來

王麗麗

[提要] 阿壠是所謂“胡風集團”中的重要作家，但有關他的文獻資料卻相對較少。《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可以看作胡風和阿壠文學活動的日常工作檔案和“七月派”研究的編年史料，特別值得學界關注和重視。本文試圖對這些往來書信作一全面而細緻的解讀，重點在於辨析造成阿壠書信中“好戰”因素的複雜緣由，胡風和阿壠這一時期的通信，證明阿壠對當時一些文人的批評，雖有偏激和過火之處，但並非出於“宗派主義”。與其糾結於這一含混的政治罪名，不如對之展開知識考古，以便讓隱藏在歷史的褶皺和幽暗地層中的真相大白於天下，從這些書信中還可以看到阿壠多處自剖心肝、直見性情的文字，有些甚至可以視為對其不幸命運的預言。

[關鍵詞] 阿壠 胡風 書信往來 “好戰” 知識考古

[中圖分類號] I20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6) 02 - 0154 - 10

一、阿壠和胡風的通信與交往

在1950年《人民日報》針對阿壠的兩篇文章《論傾向性》和《略論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所發動的猛烈批判中，人們實際上已經可以明顯感覺出其後討伐“胡風文藝思想”的意識形態邏輯。由此也可以見出，阿壠（原名陳守梅、陳亦門，筆名S.M.、聖門等）在所謂“胡風集團”中位置之重要。但對於一般的研究者來說，有關阿壠的文獻資料卻相對較少，僅有的一些也不太容易找。因此，由阿壠先生的獨子陳沛和胡風先生的女兒曉風共同輯注的《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以下簡稱《全編》）的推出，就特別值得學界關注和重視。

舉一個最小的例子：據阿壠親友編寫、修訂的《阿壠年表簡編》記載，阿壠於1907年2月生於杭州，^①陳沛在《懷念爸爸》一文中却說“爸爸出生於1907年11月”，然而緊接著又補充道，“至今，誰都說不出他準確的生辰”。^②其實，在《全編》所收的阿壠於1940年3月9日自西安致胡風的信裡，這位“七月派”最重要的詩人之一，曾經這樣談及過自己的生日：“偶然翻翻日曆，看到了自己的生日，雖然離它還有三個星期，忽然心情汹涌得那樣，禁不住一氣寫下了

約二百七十行的詩。”^③照此推算，阿壘那年的生日大約應該為3月30日。考慮到阿壘出生的年代國人生辰多以農曆為準的傳統習慣，再對照現今的萬年曆，1940年3月30日應為農曆的二月廿二，正好與年表中所說的2月相符。如果再將農曆丁未羊年的二月廿二轉換成公曆，則應該是1907年的4月4日。

《全編》以阿壘自1938年2月19日至1955年3月16日致胡風的346封書信為主體，同時將胡風致阿壘現存的全部36封書信按照相應的寫信時間附入。對照《胡風全集》第9卷書信卷收錄的34封“致阿壘”的書信，《全編》增補了胡風1947年9月28日和10月1日自上海致阿壘的兩封信。這兩封短札主要是胡風與阿壘商量如何找人營救當時被國民黨中統逮捕的賈植芳夫婦的，後均被《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摘引。之所以尚有“遺珠”，據書前的“出版說明”，是因為與“第三批材料”相關的書信在平反後由公安部另行歸還。

阿壘與胡風通信長達17年有餘，編者將全書分為四輯，與其說如所宣稱僅僅是為了讀者閱讀的方便，不如說是自然突顯了胡風和阿壘交往過程中重要的時空界標。

1937年8月12日，阿壘作為國民黨軍八八師五二三團少尉排長，開赴上海閘北抗日前綫，在淞滬戰場堅持抗戰兩月有餘，於10月23日的日機轟炸中右面頰及牙齒受一等重傷，被送往南昌醫院再轉長沙醫院救治。正是在長沙療傷期間，他給當時正在武漢主編《七月》的胡風，發出了現存的第一封投稿信。出院後，在湖南衡山短暫擔任軍事教官期間，阿壘在胡風的幫助下，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吳奚如的介紹和安排，先單身一人跋涉一個月，由衡陽步行至西安，再由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聯繫後前往延安。從1938年11月底至1939年5月初大約半年的時間中，阿壘先後入抗日軍政大學慶陽四分校、延安抗大學習。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和他本人的經濟條件，實際上，阿壘的牙傷一直到建國初期都沒能徹底痊愈。1939年4月，在牙床潰瘍糜爛發燒的狀態下，阿壘堅持參加野戰演習，於躍進中摔倒，右眼球被地面雜草蒺藜刺破，經組織上同意至國統區西安醫治，後因交通綫被封鎖而未能返回延安。阿壘利用在西安治療“牙眼”的半年時間，重寫在延安學習期間起意並已經寫成了兩章的長篇戰爭小說《南京》（原稿未能携出），並於1939年10月完成全書。此後，滯留西安的阿壘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戰時幹部訓練團第四團，任少校教官。1941年2月底，阿壘又由西安至重慶，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軍事處第二科，任少校科員；不久，轉入軍令部第一廳二、三處，任少校參謀。對於此一階段的生活，阿壘在1940年11月20日自西安致胡風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自我小結：“只有一次戰爭，我骨如鐵柱。只有一次短征，我溶解於光明。只有在寫文章中，我完全回到了我自己。”^④

胡風於1938年9月撤離武漢。1939年7月，胡風在重慶復刊《七月》。當阿壘1941年3月初到達重慶的時候，這是兩人生活空間的第一次交集。但早在這一年的1月22日，當時尚在西安的阿壘，就在信裡向胡風報告了“新年中第一件不愉快的事，是東平們底命運在我底心上所提出的控訴”。^⑤這就是“皖南事變”，《七月》最重要的戰地報告文學作家丘東平，事變之時正在新四軍軍中。5月7日，為了對發動“皖南事變”的國民黨表示抗議，胡風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自重慶撤退至香港。在《全編》第一輯所收書信的1938~1941年間，阿壘和胡風名義上在重慶聚首的時間不過兩個月。

《全編》1942~1945年的第二輯，就從阿壘1942年3月12日在重慶所寫的信開始，這是對胡風於3月7日自淪陷後的香港安全撤回到桂林後來信的回復。一年後的3月27日，胡風回到重慶。從這時開始，直到1946年2月25日胡風因抗戰勝利復員回到上海為止，將近有三年的時光，

阿壘與他“心所敬愛”^⑥的師長胡風同處一地。在此期間，阿壘於1944年春考入國民黨陸軍大學第二十期，並晉升中校，同年結婚、次年生子。但這也是兩人生活空間的最後一次重疊。

第三輯的1946~1948年，是阿壘一生中最不幸痛苦而又憤怒動蕩的一個時期。1946年3月17日，妻子張瑞自殺身亡；4、5月間，岳母因為悲傷過度而病故。正當阿壘痛感“仿佛一個社會整個底力量，一下都撞到我胸上來”^⑦時，9月又接到母親垂危的電報，10月17日，家中“只有這一個”“對我是重要的”^⑧人也終於故世。接二連三受到慘重打擊的阿壘先是感覺“我有報復的毒念！”^⑨然後悲痛麻木成“冷冷然憎恨一切”，^⑩直至發出抵抗的絕叫：“這個必須擊碎的世界！”^⑪

本來，阿壘因回延安無望而重進國民黨軍事部門的時候，還是國共共同抗戰時期；“皖南事變”當中，阿壘明顯傾向“東平們”；到重慶之後，阿壘又與當時的一批進步學生交往密切；1946年夏，阿壘從陸軍大學畢業以後，到成都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任中校戰術教官。在重慶和成都期間，極端厭惡內戰的阿壘，多次利用職業的便利，收集有關國民黨軍隊編制和部署方面的軍事情報，托胡風等朋友轉送延安。1947年5月，阿壘因情報工作被察覺，而從成都出逃至重慶。其時，以國民黨中央軍校教育長關麟征署名的通緝令亦到重慶，阿壘於是東下南京。在他職業無著、輾轉杭州、南京兩地“這毫無辦法的艱難時期”，^⑫阿壘從胡風處獲得了精神和物質的支持和援助。同年8月，阿壘化名陳君龍，入南京中央氣象局任資料室代理主任。1948年7月，阿壘進入國民黨陸軍大學兵學研究院第十六期，任中校研究員；10月，任國民黨陸軍參謀學校上校教官。就是在任職南京期間，阿壘提供的號稱“左軸回旋”的國民黨魯南作戰計劃，通過胡風轉交地下黨組織的廖夢醒，直接為解放軍在“孟良崮戰役”中取得重大勝利提供了軍情參考。

阿壘在1949~1955年間寫給胡風的121封信及其5封附信構成了《全編》的第四輯。1948年12月，按照香港轉來的黨的指示，胡風單身離開解放前夕白色恐怖日益加重的上海，繞道香港，於1949年1月進入東北解放區，3月，隨中共中央統戰部進入北平。4月23日和5月3日，南京、杭州相繼解放。當時已經參加第一次文代會籌委會的胡風在5月7日給在杭的友人去信，並問及路翎和阿壘。5月22日，阿壘在家鄉杭州給胡風覆信。6月，阿壘應邀出席在北平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9月，經羅飛介紹，他一度參加上海鐵路公安局的工作。1950年元旦到天津，任天津文聯創作組組長和天津文協編輯部主任，直至1955年5月被逮捕。所以，《阿壘年表簡編》中的“1月11日到天津”^⑬一句不確，因為阿壘1950年1月1日自天津致胡風信的第一句就是：“我今天到天津了。”^⑭

二、阿壘書信中的“好戰”文字辨析

阿壘與胡風的往來書信，同時也可以看成是兩人文學活動的日常工作檔案和“七月派”研究的編年史料。

《全編》第一輯基本上對應著阿壘主要以S.M.為筆名，在《七月》上發表戰地速寫、報告，以及創作《南京》的時期，亦即戰爭文學時期。阿壘在《全編》第二輯時期的代表性文學活動，則分別是詩歌的結集和詩論寫作的噴發。1942年8月，詩集《無弦琴》被列入胡風主編的“七月詩叢”，由桂林南天出版社出版。而1945年1月的《希望》在重慶的創刊號，也以刊登一篇《箭頭指向——》，預示著阿壘詩論寫作豐產期的到來。

在1946~1948年間，身為“痛苦之子”^⑮的阿壘，抱持著“用所謂理想給創口塗些止痛的藥”、

“以友情和工作來相濡以沫”^⑥之心，以“要求一種不斷的工作”，作為掙扎、自救於“足以毀敗我”^⑦的苦痛之中的方式。這一時期，除了擔任與方然、倪子明等人在成都創辦的同人刊物《呼吸》的實際主編之外，他的詩論寫作也蔚為大觀。1948年1月16日，阿壠就曾“約略估計”當時已經完成的詩論“共四十八篇”，“當在三十萬左右了”。^⑧等到1949年8月15日整理的時候，却已經“近五十萬字，計六十八篇”^⑨了。這些成果後於1951年11月結集為《詩與現實》三卷本出版。

此一時期阿壠的文字，除了在總共才出版了八期的《希望》上刊行之外，更多的還見之於各地一批由他和胡風的朋友們創辦的、帶有鮮明“七月派”標記的刊物。這些刊物主要包括阿壠在成都親自參與編務的《呼吸》和《荒鷄小集》，北平朱谷懷編輯的《泥土》，由化鐵和歐陽莊在南京創辦的《螞蟻小集》，以及滿濤等人在上海出版的《橫眉小輯》，等等。無論在當時人還是現在的一般研究者眼裡，這些文字似乎都很“好戰”，以至於成了認定胡風、阿壠等人從事“宗派”活動的明證。確實，僅從《全編》中就可以看出，阿壠的詩論除了正面闡述他所理解的詩歌本質、性格特徵和戰鬥方法等問題之外，其中很大篇幅都是針對他所認定的、當時詩歌創作中存在的問題所作的不少峻切的批評。批評涉及的對象既包括何其芳、袁水拍、沙鷗、陳敬容、臧克家等各派詩人，也包括在當時出版過詩論著作的朱光潛、朱自清、李廣田等一批學者。此外，阿壠明顯還是胡風及其朋友討伐姚雪垠的主力。

要恰當研判這些文字，不能離開胡風和阿壠等人在這一時期的現實處境。1945年，胡風因為不滿于潮（喬冠華）、陳家康、項黎（胡繩）等人在重慶發起的反教條主義運動被強行遏止，而在《希望》創刊號上發表了舒蕪和自己聲援和堅持“才子集團”思想啓蒙思路的文章，從而釀成了著名的“主觀”公案，並連鎖引發了王戎與邵荃麟、何其芳關於“傾向性”和“現實主義”，以及呂熒與何其芳關於客觀主義的討論。時在成都的阿壠致上海的胡風信中的一句話，比較準確地透露出了胡風及其朋友對這些事態的即時理解：“今日接到管兄（方管，即舒蕪）信，說是重慶還‘缺席裁判’似的呢。”^⑩從1948年5月25日開始，在這一輯最後的十封信中，阿壠屢屢提到他和路翎等人準備回擊以“懷君（于懷，即喬冠華）”和邵荃麟領銜的香港《大眾文藝叢刊》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如果在這樣兩次重大論爭的框架中審視阿壠此一時期的文字，就可以明瞭所謂“好戰”中的很大部分，實際上僅僅出於被動的“應戰”，而其中因為憤激而產生的“辛辣”，也應該更容易獲致人們的理解。

或許，今人不難體會阿壠對身兼左翼批判者的何其芳、袁水拍等詩人的不敬，是由於雙方在“大眾化”、詩歌介入政治等問題上素有分歧，但對他激烈批評陳敬容、穆旦等後來被稱為“九葉詩人”的詩作，却難以輕表同情。雖然從《全編》中可知，阿壠最初注意到沙鷗和陳敬容，純粹是因為雜誌編輯的“似乎出題目作文”。^⑪但一旦被詢及，作為《七月》同人的阿壠，對陳敬容等帶有現代主義傾向的詩作不能產生好感又幾乎是注定的。因為早在1938年1月16日，在胡風於武漢召開的“七月社”第一次座談會上，當議及文藝表現抗戰的新形式的產生問題時，艾青剛一提及歐洲大戰之後所出現的未來主義和達達主義，馮乃超馬上就警覺地指出，這些歐戰後的流派，其意義僅在於“反抗傳統”，它們“是從現實生活游離出來的”，因而是健康的。而樓適夷則更明確地對現代主義表示了拒絕：“中國民族革命戰爭和歐洲大戰，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未來主義達達主義等所表現的是苦悶與彷徨，但我們今天的戰爭，是有光明與勝利的遠景的。離開了現實主義文藝就沒有前途。”在樓、馮兩人的引導之下，座談會的討論成功規避了“向神秘

的道路走”，而明顯趨向“一誦出即達到大眾心坎裡”的、諸如報告詩、朗誦詩等“更大眾化”的文藝形式。^②馮、樓兩人的觀點幾乎奠定了其後數十年左翼文藝界看待現代主義的基調。

然而，如果將阿壠對陳敬容的“攻擊”，僅僅理解為“七月派”同人面對現代主義詩藝，因為固守所謂“健康/頹廢”的藩籬，而表現出某種視野的狹隘和目光的短視的話，那依然是對歷史複雜性的輕忽和過簡處理。

在1948年3月19日阿壠自南京的信中，有這麼一句不引人注目的話：“原來信，請寄香粉，便時請寄一點。”^③“原”應該指詩人綠原，“香粉”即《橫眉小輯》的第一輯《論香粉鋪之類》。該輯以刊中所載的一篇方典（王元化）的文章為標題。因為該文似乎“很不正確地”批評了錢鍾書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廣受贊譽的小說《圍城》，大概就連作者本人，晚年也不一定願意提起這篇好像純然出於“少年輕狂”之作了。但細讀這篇文章就一定能夠感覺出，早年的王元化在寫作的當時，其內心充溢著的那種要把“偽善的法利賽人”從神聖的文學殿堂裡趕出去的正義之情是無比真誠的。

實際上，《圍城》中諸如對鮑小姐“赤裸裸的真理”和“局部的真理”之類的描寫和幽默譏諷，僅僅是王元化據以作出“色情襲擊到我們的文藝裡來”這一批評斷語的諸多文壇現象之一。作為“魯迅、羅曼·羅蘭、契訶夫……的愛好者”，王元化理所當然地將文學當作洗滌靈魂、升華精神的崇高力量之源，所以他絕難理解，不僅是鴛鴦派人物，甚至連顯見的“學者”、“嚴肅的文學工作者”、“進步劇團”，都“在幹著這種他們所不配幹的勾當”。最令他憤怒和不可容忍的是，劇團演出專刊還以克利斯朵夫語錄為標榜，將一個巨人“慘痛的戰鬥”和“壯烈的呼聲”，變成了“香粉鋪的裝飾品”！^④“香粉鋪”一語，就出自於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在第五卷“節場”中，初到巴黎的克利斯朵夫深為法國文壇的淫猥怪异而震驚痛苦。羅蘭寫到其中一股“完全淹沒”了克利斯朵夫的文學洪流，是那些“只為了勾引男人”的女性寫的“像雨點那麼多的小說”，這些小說“把私情醜事公諸大眾”，“令人讀了如入香粉鋪，聞到一股俗不可耐的香味與甜味”。^⑤王元化就將他為之“驚異”的文壇“猥褻文字”，方之於“克利斯朵夫在‘節場’所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

需要探究的是：為什麼早年的王元化在《圍城》裡只看到了“色情”和“俏皮話”，而“看不到人生”^⑥？《圍城》裡圍困著的，不正是方鴻漸們瑣屑凡庸的灰色人生嗎？準確的答案是，王元化沒有看到的，是他希望、理想中的人生，像克利斯朵夫那樣壯烈、昂揚的奮鬥人生。而顯然，在當時的他看來，後一種人生才是1948這樣陰霾冷黯的年代裡國人最為亟需的。

問題是，在我們的文學史敘述中，羅曼·羅蘭被歸入19、20世紀之交的批判現實主義，而《圍城》顯然已經帶有明顯的現代主義特徵。如果對世界文學的“發展潮流”缺少必要的敏感，至少不也表明了批評寫作者的不稱職嗎？殊不知這種綫性“進步”的推論本身，或許又不折不扣地體現了現代偏見之一。

羅曼·羅蘭寫作《約翰·克利斯朵夫》時期是1904~1912年，已經完全進入了20世紀初葉。在馬歇爾·伯曼（Marshall Berman）等現代性理論家看來，20世紀也是現代性自16世紀以來、五個世紀發展歷程中的最後一個階段。此時，現代性已經喪失了它在19世紀由尼采、馬克思等所有偉大的現代主義者賦予的辯證結構，不再擁有那種“表達和掌握一個每一件事物都包含有其反面的世界”^⑦的思考深度和能力。現在看來，現代主義文化內在包含的、得自現代生活根源深處的矛盾和悖論，必然會在20世紀繼續展開，而其極端發展和陷入困境，可能一直要到20世紀

後半才會被伯曼等人清晰地體驗到，但處在上兩個世紀之交的羅曼·羅蘭，也完全有可能以他沿襲自 19 世紀的、生機勃勃的理想主義精神追求和入道主義關切，對 20 世紀開端法國文壇已經初露端倪的現代主義弊病，諸如對現代生活平庸和荒謬的末世感，以及對世俗男女身體和欲望“無微不至”的關注，發出準確的預警和犀利的批判。

入選《橫眉小輯》的標題文章以及同人間轉相搜求，“七月派”同人對《論香粉鋪之類》的推重，大概就源於他們與羅曼·羅蘭邏輯的同構，以及對後者政治傾向的認同。由此可以進一步排除他們批評文章風格方面的“宗派主義”嫌疑，因為羅曼羅蘭對法國文壇的“苛責”有多深，“七月派”同人對批評對象的“痛詆”就可能有多痛快淋漓。依此思路，假如把阿壠對陳敬容等人的批評，理解成“七月”和“九葉”兩大詩派，在激烈動蕩的 1940 年代的中國新詩界，展開的“相生相剋”的交流和互動，應該更具建設的價值和文學史的意義。同樣的角度，也有助於我們討論胡風及其友人對姚雪垠等作家“色情”和“市儈主義”的指斥。

與現今的定位截然相異的是，阿壠對朱光潛先生的批評，在當時的胡風看來却是當然的敵我鬥爭：“弄朱光潛，很好。我們就和正面敵人對一對給他們看看吧。”²⁸“他們”也即同信中亦有提及的郭沫若、茅盾等左翼對手。如果說胡風和阿壠自感與“他們”構成魯迅先生所說的“橫站”的對峙態勢的話，那麼朱光潛先生却被當時的左翼同人視作共同的“正面敵人”。這一點可能很容易被現在的研究者忽視，但只要讀一讀郭沫若不久以後發表在《大眾文藝叢刊》上的《斥反動文藝》就可了然，郭文赫然稱朱先生為“藍衣監察”。當然，阿壠批評朱光潛、朱自清和李廣田等學者，主要還是因為他們都在 1940 年代出版了有影響的詩論著作。同樣出於分析探討、切磋批評的目的，在同期亦有詩論問世的艾青，儘管是同道朋友，也曾經被列入阿壠批評的寫作計劃。此外，朱自清和李廣田還同為西南聯大的教授，他們的詩論顯然與“九葉詩派”的創作有一定的關聯。

證明阿壠的四面出擊並不是出於“宗派主義”的初心，並不意味著“七月派”同人的工作就毫無可議之處。事實上，對於他們這一時期文字中表露出來的情緒偏激和用詞過火的失當，同人之間並非沒有客觀中肯的告誡和自我反省。

在 1947 年 9 月 9 日自上海致南京阿壠的信中，胡風就特意提到：“得北平朱穀懷信，內中有一段，另紙抄下。我覺得他說得很好。”顯然朱穀懷明確批評了阿壠和方然主編的《呼吸》和《天堂的地板》。對此，胡風還補充說：“我看，朱（聲，即方然）和周（遂凡，即綠原），行文都有聊以快意的成分，這會產生很大的害處。”²⁹他並且囑咐阿壠將朱信摘抄閱後再轉方然和綠原。阿壠則在兩天后的回信中誠懇表示：“朱的話，我很感謝，和羞愧。對你也如此。相信我！我是懷著一種悲憤弄的，決不是意識地避去嚴肅。渴求一擊是有的。那麼，教育我！我不想到客觀上却會如此。”³⁰

1948 年 3 月 19 日，在香港《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出版半個多月後，阿壠對自己感情濃烈的批評文風作過反省：“愛和恨都強大地壓迫著我，而事情又並非不嚴重，因此，自己也明知說話帶著了感情，但是這是一種流露。”³¹4 月 8 日，胡風又在信中附上了朱穀懷對阿壠批評李廣田表示異議的信，這促使了阿壠在 11 日的回信中進一步的自我剖析：

我往往如此，“獅子搏兔，亦盡全力”，……我感到：假使例子強於論點，那是論點本來就弱；反之，像這樣，論點強於例子，就好像壓迫了冤枉了人。其實，人倒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毋寧是論點。人，為了展開或者證明論點罷了。³²

至於胡風，在寫於 1977 年下半年的長篇獄中思想彙報《簡述收穫》中，他對自己在反擊香港批判時所用的一些“刻毒的諷刺比喻”、與自己“有思想聯繫”的“小刊物”在反批評時“發泄”的“不滿之氣”，以及友人通信中“信口打諢”的“用語與口吻”有時“竟至達到了輕薄和惡劣的地步”^⑧，都作了極為沉痛的反省和真誠的自我批評。

三、照亮歷史的褶皺和幽暗地層

從 1950 年起，阿壠開始深深地捲入了“胡風事件”在建國後演變的各個主要環節。本來，新的時間開始了，而且終於可以一心一意地從事摯愛的文學了，所以初到天津的阿壠熱情很高：“我打算寫兩個小冊子：《論藝術人物》和《拿破侖戰史》”。^⑨不料，“《論藝術人物》第一章”《論傾向性》^⑩剛在天津《文藝學習》上發表，就遭到了《人民日報》的猛烈批判，緊接著被批判的還有刊發在上海《起點》第 2 期上的《略論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這一著名事件學界已有一定的討論，但《全編》投注的光亮仍然有助於我們看清歷史的一些褶皺和幽暗地層。

最值得玩味的是阿壠對兩篇批評文章的先後反應。3 月 16 日，阿壠在天津致胡風的信中，敘述了他剛剛結束的一次進京，主要是聽周揚關於“接受遺產”和“正確對待民族傳統”的報告。在比較詳細地轉述了報告筆記要點之後，阿壠加上了一句評論：“我聽得很興奮。講得也很好”。然後又提到“最近，文藝上開始展開了批評”，其中包括陳涌在 3 月 12 日的《人民日報》上“批評了《論傾向性》，指出了它否定了政治。”對此，阿壠的理解是：“目前強調思想鬥爭”，而且非常“複雜、艱巨”。最後，該信以“拉雜的談這些，我也興奮和幸福了”一句結束。^⑪

僅僅 3 天之後的 19 日，在看到當天《人民日報》發表的史篤的《反對歪曲和偽造馬列主義》一文之後，阿壠的語氣大變。稱呼之後，劈頭第一句就是：“今天看到天佐批評我。”然後基本上都是自責、難過和懊悔無及：“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如同用爆炸物爆炸了自己，如同必須刺瞎自己底眼睛”，“非常痛苦和泄氣。……對師友們，我底罪過多大！”^⑫

這一讓軍人出身的阿壠幾近精神崩潰的事件，其基本事實在今天已經清楚：爲了反對文學作品對正面人物的神化，阿壠徵引了馬克思在《新萊茵評論》上的兩段書評。在不瞭解緊接著評論之後，馬克思還有披露所評論的兩部作品的作者複雜身份的一句話的情況下，把馬克思所概括的那種不同於以往對革命領導人頭戴“拉斐爾式”的“靈光圈”、而是“深入”了他們“私生活”^⑬的描繪方法稱爲“範例”和“方向”。批判者史篤因此判定阿壠“有意隱瞞”最後一句話，目的是爲了“盜用馬列主義詞句”，然後“做出馬克思把特務的著作推薦給我們作‘範例’和‘方向’的罪惡推論”。^⑭

“有意隱瞞”云云，純屬深文周納，因爲同時的節選本大都不選這一句說明，而權威的全譯還在呼籲和期待當中。但儘管如此，今天的我們仍能想見這一類的“硬傷”在當時可能具有的震撼程度，即便如何證明那是“無心的漏抄”。況且，對於這種無視基本事實、將學術和思想問題無限上綱的大批判手法，人們在後來的歷史中也並不鮮見。但《全編》却不得不讓人意識到，在史篤仿佛欲置人於政治死地的指責背後，確實有個人恩怨的隱秘驅動。因爲史篤即蔣天佐的化名，他並不是第一次與阿壠在理論上交手。早在 1948 年，他就批評了阿壠的《語言片論》等文，而在通信中，阿壠與胡風也多次討論過反批評文章《語言續論》的寫作和發表。而正是在 1948 年，蔣天佐與陳敬容結婚。

指出這一事實，目的並不在於將“宗派主義”罪名的矛頭調換方向。即便史篤真將個人的情

感摻雜在 1950 年的批判之中，那也必須以他私人的衝動和主流文壇的需要取得契合為前提。正如“宗派主義”可能遮蔽我們恰當評估阿壠對穆旦等人的批評所可能包含的洞見，即現代主義由於相對超前舶來而必然帶有先天局限，“宗派主義”同樣也可能掩飾史篤對阿壠的批判背後權力運作的深層機制。因此，與其糾結於這一含混的政治罪名，不如撥開歷史浮淺的表層，考察是什麼樣的時代關切，形塑了“七月派”不無激烈的話語方式？權力經過了怎樣選擇、排斥和界定的運作，建構了建國初的批評話語形態？最為赤誠的戰士詩人阿壠，與人稱中國現代最抒情的女詩人陳敬容；強調主觀意志燃燒的“七月詩派”，與尋求情感表達客觀和曲折的“九葉詩人”之間，如何在並不全然愉快的碰撞之中，共同豐富了 1940 年代中國詩歌的圖景，並在對抗和競爭中相互映照出雙方的洞見和限度？甚至，《圍城》和張愛玲蘊含的現代主義潛力，為什麼還需歷經數十年的現代“時間”，才會引發國人滯後的共鳴？

同樣在《全編》的光亮中清晰起來的，還有羅飛和梅志等人在上海創辦的《起點》的命運。這一“胡風派”惟一誕生於解放後的同人小刊，顯然因為第 2 期上的問題論文而被阿壠緊急叫停。其實，早在批判發生之前的 3 月 2 日，《起點》就遭遇“一期北京說不賣了”。翌日，阿壠從天津的書店問明白，停止銷售《起點》是“總店通知的”。^④儘管如此，當阿壠 4 月份寫成反駁陳涌和史篤批評的文章以後，仍然這樣表示：“寄北京，我估計未必刊出。上次杭（行，即羅飛）兄來信說，還要弄一期，那麼，等一下，等我寄北京不刊後就發表。”^④

6 月 13 日，當反駁文章正式被周揚附信退回時，阿壠又表達過同樣的意思。但《起點》3 期終於未出。

此外，阿壠還是積極主張胡風 1954 年上書的朋友之一，並向胡風特別建議加強報告最後的正面意見部分，亦即“三十萬言”中“作為參考的建議”。當上書最終失敗，阿壠努力保全胡風的真摯願望令人動容：

我敬愛你，一直到今天、將來，長兄似地敬愛你。我不能忍受你被毀滅。……我相信你底赤誠，也相信將來你將給與事業的光輝，關鍵是現在，關鍵是在現在首先從自己底弱點來開始求得解決……

因此，我建議：詳密而深刻地作一自我檢查，一直做到連批評者也都做不出來的那樣的地步。^④

在《全編》中，阿壠還有多處這樣自剖心肝、直見性情的文字。由於過去的國軍軍人經歷，阿壠在建國初期的求職和工作中都遭遇了一定的尷尬。在他短暫參加上海鐵路公安局工作期間，阿壠表達過這樣的感受：“我詳盡地寫了自傳，這是我們的態度。沒有想到往往赤心相見的場合築起了障礙。”^④

在此之前，阿壠希望繼續發揮專長參加軍事工作的願望沒能實現，他的心情表白既有類似魯迅般的知識分子遠見，又有軍人的自我犧牲精神：

始終堅信著：未來將是美好的，人民將是幸福的——不管要走多少迂曲的路，也不管會有多少正直的人遭遇了不被理解。每一次的革命都如此，特別是這改變世界的大革命，當革命的大踏步向前直進時，只要所有的，前面是這美好的未來和幸福的人民，個人的骸骨也可以這樣鋪砌道路。

即使自己“將被踏碎”，仍然“相信這個政權，相信人民和未來”。^④這是阿壠為自己所作的預言。相對於一般敏感的詩人，阿壠身上的預言家氣質似乎格外突出。

要開作一枝白色花——
因為我要這樣宣告，我們無罪，然後
我們凋謝。^④

這首《無題》原本是阿壠在1944年9月寫給新婚不久的妻子的。1981年，劫後的綠原首次將自己編選的“七月派”二十位詩人的詩歌合集命名為《白色花》。從此，這一詩句也就成了整個“七月派”無罪的集體告白。

1952年6月9日，面對昔日的友人舒蕪的“倒戈”，阿壠這樣告訴胡風：“我記起那首‘卑賤而又卑賤的靈魂’的詩，想不到，却在他底皮囊中看到！”^⑤8月18日，阿壠再次表示：“不斷地想起我早年那猶大的詩來。”^⑥

令阿壠一再產生不幸而言中之感的，是那首收入《無弦琴》的《猶大》。早在1941年10月，阿壠就在該詩中發過這樣的議論：

十二門徒中
明知猶大在。
……
人之子一個人
是無可出賣的；
出賣了的是
一個卑賤而又卑賤的靈魂
那個猶大他自己。^⑦

在1941年3月7日給胡風的書信附詩中，阿壠還咏嘆過那位詩酒風流、同時還給《孫子》作過注的晚唐著名詩人，最末兩句幾乎亦可當作阿壠一生命運的準確自況：

當時杜牧真何奈，
詩卷兵書總可哀。^⑧

①⑬耿庸、羅洛編寫，綠原、陳沛修訂：《阿壠年表簡編》，見阿壠：《阿壠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3月，第571、575頁。

②陳沛：《懷念爸爸》，見北京魯迅博物館編：《一枝不該凋謝的白色花：阿壠百年紀念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頁。

③阿壠1940年3月9日自西安，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8月，第44頁。

④⑤⑭⑲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59~60、63、254、226、193頁。

⑥阿壠1939年7月6日自西安，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20頁。

⑦阿壠1946年5月17日自重慶，見陳沛、曉風輯注：

《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127頁。

⑧阿壠1946年9月9日自成都，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142頁。

⑨阿壠1946年4月12日自重慶，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119頁。

⑩阿壠1946年6月3日自成都，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130頁。

⑪阿壠1946年9月21日自重慶，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143頁。

⑫胡風1947年8月18日自上海，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186頁。

⑬阿壠1946年4月26日自重慶，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122頁。

⑭阿壠1947年3月27日自南京，見陳沛、曉風輯注：

《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166頁。

- ⑰阿壠1947年8月20日自杭州，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187頁。
- ⑱阿壠自杭州，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217、246頁。
- ⑳阿壠1946年8月5日自成都，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137頁。
- ㉑阿壠1947年9月3日自南京，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191頁。
- ㉒《抗戰以後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座談會記錄》，漢口：《七月》，第2集第1期（1938年1月16日）。
- ㉔⑳方典：《論香粉鋪之類》，《橫眉小輯》第1輯，上海：橫眉社，1948年。
- ㉕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卷五·節場·第一部），傅雷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574頁。
- ㉖馬歇爾·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烟消雲散了》，徐大建、張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9月，第26頁。
- ㉗胡風1947年11月2日自上海，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208頁。
- ㉘⑳阿壠自南京，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194、225、228~229頁。
- ㉙胡風：《簡述收穫》，見梅志、張小風整理輯注：《胡風全集》第6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622、653~654頁。
- ㉚阿壠1950年1月4日自天津，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255頁。
- ㉛阿壠1950年1月15日自天津，見陳沛、曉風輯注：

《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256頁。

- ㉜⑳阿壠自天津，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263~264、264~265、324、332頁。
- 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13頁。
- ㉞史篤：《反對歪曲和偽造馬列主義》，《人民日報》，1950年3月19日。
- ㉟阿壠1950年3月3日自天津，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262頁。
- ㊱阿壠1950年4月18日自天津，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271頁。
- ㊲阿壠1955年2月11日自天津，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362頁。
- ㊳阿壠1949年11月1日自杭州，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253頁。
- ㊴阿壠1949年9月6日自杭州，見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249~251頁。
- ㊵⑳周良沛輯注：《阿壠詩鈔·遺稿·遺言》，見北京魯迅博物館編：《一枝不該凋謝的白色花：阿壠百年紀念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第205、202頁。
- ㊶阿壠自重慶，陳沛、曉風輯注：《阿壠致胡風書信全編》，第66頁。

作者簡介：王麗麗，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博士。北京100871

[責任編輯 桑海]